

•学者视阈•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成为一项国家战略。随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各地掀起了“智库热”。智库是影响政府决策、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民政部门如何加强智库建设,用足用好智库?2015 年 3 月,《中国社会报》记者专访我校熊思东校长,他就民政部门怎样用好智库谈了自己的见解。现将全文转载如下:

加强智库建设 用足用好智库

——熊思东校长谈民政部门怎样用好智库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等。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政的职能日益凸显,面临的挑战日益增多,在今年的两会上,养老、社区、社会救助等关乎亿万群众切身利益的话题受到了代表委员的高度关注。破解这些难题,需要发挥智库的作用。民政部门怎样才能更好地利用智库?就此问题,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

记者:智库的作用到底有多大,民政部门事业发展是否已经到了大事必问智库的阶段?

熊思东:过去,某些政府部门在需要

决策的时候,领导一拍脑袋,或者组织一个秘书班子写个东西就完事儿。也有的政府部门会组建专家组,但这种临时组建的专家组在人员构成上往往比较单一,其研究往往存在碎片化和视野狭窄等弊端,因此很难拿出系统性、操作性强的报告或建议。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出台政策必须请人员更加固定和多元化



的专家团队——智库——进行调研论证。民政系统也一样,民政事业关乎民生,是社会建设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负责社会服务的提供、社会公平的维护、基本民生的保障,还参与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进步。因此,我国民政事业的重大决策,也一定要更全面、更科学、更有效。为此,智库的作用就十分重要。

记者:我国现有的智库大致包括官办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民政部门该如何选用智库?

熊思东:从美国以及西方先进国家智库建设的情况来看,比较成熟的智

本期要目

熊思东:加强智库建设 用足用好智库

权衡: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加快建设国家高端智库

田晓明:做正确的事 正确地做事

方世南教授研究成果获苏州市委书记周乃翔重要批示

薄洁萍:充分认识基础研究对智库建设的重要性

·学者视阈·



库，多是由社会力量来构建的。官办智库技不如人，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官办的性质决定了其视野会局限于本条块。二是因为官办智库由于和政府部门在经济、人事方面关系过密，加上工作的惯性，容易失去客观性和独立性，沦为御用智库。第三，官办智库由于过分熟悉所服务部门的工作理念、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一个秘书性的、附和性的研究团体。

相比之下，尽管非官方智库对于有些情况掌握得不是特别全面，但其见解往往更客观。因此，政府部门不宜用自己的钱去养一个智库为己所用，而是应该注重启用性质更加独立的非官方智库。

非官方智库主要包括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目前我国民间智库主要活跃在经济领域和管理领域，关注民生、民政的智库相对较少。此外，我国的多数民间智库由于起步较晚，积累不足，发挥更大作用尚需时日。相比之下，很多综合性大学拥有多元化的专家队伍，有些学校在社会学等相关领域更是有着很好的传统和优势，是民政部门智库选择的一个重要资源。

记者：民政部门启用高校智库应该注意什么？

熊思东：要重点做好以下几点：第一，选择在相关和相对应领域研究有传统优势和品牌的智库。有些智库自以为万能，什么项目都敢接；有些智库还在为生存而挣扎，只能做万金油，能拿到什么项目就做什么项目。对于这样的智库，一定要敬而远之。

第二，同等条件下要选择人员结构好、团队精神好的智库。一个智库，既有学术素养一流的成员，又有了解政策的历史脉络和政策走向的成员，还有关注同类国家、地区相关政策的成员，才能

提出立体化的、完备、周详的政策建议、趋势判断或历史经验的总结。而这样一个多元化的团队，团队协作自然就愈加重要。但现实中，有些智库将智库研究简单地等同于学术研究，只是从书本到书本；或从书本到现场，再从现场到书本，导致其研究缺乏实用价值；有些智库的专家们缺少深入基层的意识或机会，以致既不知道应该搜寻什么信息，又可能缺乏获取一手资料的渠道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导致研究结果往往可靠性低、指导性差；有些智库虽然人才济济，但文人相轻。

第三，尊重其独立性，不要轻易去干预其内部事务。就像到一个合伙制律师事务所请律师一样——遇到国际贸易纠纷，找一个在国际商法领域有名气的律师事务所就行，而不必过问律师事务所派哪位律师，政府部门选择智库也不要过于迷信专家，不要先入为主。

第四，智库提供的是智力支持，而不是代替政府部门决策。智库牌子再大，业内精英再多，政府部门也不要放弃独立思考。

第五，工作中，领导个人看好哪个专业或学派，往往就倾向于请哪个专业或学派的专家，但有时这并非理性选择。因此，选择智库时要注意避免长官意志。

记者：政府部门和智库应该保持一

个怎样的关系？

熊思东：第一，对相关的智库一视同仁，千万不要区别对待，更不能只搞一个类似“御用”智库的形式。要让智库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

第二，既给予足够的信任与支持，又不能与智库交往过密。智库成员与受托方交往过密容易使工作掺杂个人感情，弊大于利。假设政府部门跟某个智库交往过密，甚至接收智库的人挂职做民政干部，这个智库就会过于了解行政主要领导的思路、偏好和意图，拿出来的东西往往能让行政主要领导满意，但未必是客观、科学和有前瞻性的。

第三，不要把自己的调研结果都交给智库。一个好的智库，总会想方设法了解相应领域的情况，他们自己了解到的情况不一定非常全面详细，但只要足够全面、可靠就够了。因为智库通过其他正常渠道了解到的情况往往更客观。

记者：民政的很多领域都有相应的学会和协会。这些学会和协会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优秀的智库？

熊思东：协会一般带有行业的性质，学会一般带有学术的性质，这两种类型的团体要想发展成为智库比较难。以学会为例，其使命和强项是团结自己领域里的专家学者，组织开展学术交流和探讨，而不是基于系统思维和战略思维作决策、作规划，与智库的目标任务大相径庭。但现在有很多人把学术研究等同于智库的研究，并倾向于依靠专业技术领域的专家，而非决策的专家和战略的专家。我们在这方面曾经有较深刻的教训，值得注意。毫无疑问，在政策咨询和智库建设中，听取和吸纳专业学会、协会的意见对于客观判断和科学决策当然是有益的。但是如果将该类学会、协会发展成智库，要么这些学会、协会淡化其本身的功能，要么依据这类学会、协会建立的智库的工作内容和决策的视野有限。

（据《中国社会报》2015年3月16日）



•专家视点•

编者按:2016年3月18日,省委宣传部和省社科联在南京共同举办省社科界第九届学术大会高层论坛,以“树立五大发展新理念、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为研讨主题进行学术交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燕文出席会议并讲话。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双传学,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汪兴国,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之顺,省社科联理事,学术大会优秀论文作者代表以及学会代表约300人参加论坛。在高层论坛上,就智库建设的问题,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权衡研究员作了题为《加快建设国家高端智库》的精彩报告。我校东吴智库理事长田晓明教授应邀参加论坛并作学术点评。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加快建设国家高端智库



权衡 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副理事长、
世界经济所副所长、研究员

为了更好引导、鼓励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健康持续发展,真正体现高端智库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以政策和战略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率先在国内形成一批真正适应智库发展规律、体现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体系,为此十分有必要深入研究对国家高端智库发展的体制机制、评估和考核体系。

打造高端智库的关键 是要形成自身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打造具有国际知名的高端智库,关键是要形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自身发展的标准和特点,全面提升高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的高端智库的标准,应当是有助于引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实现改革创新、服务中心工作,有助于推动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有助于提出专业化、建设性和务实性的政策建议,有助于提升智库客观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这样才能体现高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

根据笔者的思考,具有国际知名的高端智库,其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应当体现为:一是智库的政策影响力,即智库如何影响、引导甚至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包括通过内部研究报告、专

报简报、建言建议、咨询专家内部咨询会议的水平 and 能力。发挥智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是高端智库的立命之本。二是智库的学术影响力,即智库不同于直接的政策决策部门,智库应当拥有坚实的学科专业背景和专业知识的支撑,因此真正具有政策影响力的高端智库,应当首先是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体系和学术背景,这一点可以确保智库能够使公共政策的制定建立在专业知识的基础之上。三是智库的社会影响力,即智库在社会以及舆论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力。高端智库不仅要能对政策能够直接产生影响力,也可以充分发挥其对社会发展、公众舆论等影响力,借助媒体、记者等发挥自身的影响力,能够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和社会话语权。这也是高端智库的重要标志。四是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即智库在国际学术界、政策领域产生的影响力,包括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影响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也体现为在一些国际重要的事件中的话语权、国际重要会议、论坛等方面的观点、思想和政策主张等。五是智库的快速反应能力,即智库要有敏锐的眼光和快速反应的能力,包括分析研究的问题导向、需求导向以及政策建议的快速反应、重大事件的快速回应等。因此,高端智库往往应当具备战略眼光、前瞻性政

策储备能力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敏锐观察、深度分析和快速反应能力。

深化体制机制和发展 加快构建具有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

当前,必须重点解决如下几方面的体制机制瓶颈:

一是推进科研考核制度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改革唯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等单一标准评价智库成果的简单量化考核方法,尊重智库规律,形成有利于高端智库发展的科学考核评价体系。

二是深入推动科研经费管理体制机制,形成有利于智库建设和发展的科研经费管理体系。目前的科研经费管理完全忽略了智库研究中人力资本是核心的特性,严格按照传统的经费管理,制约了智库发展的活力和创新积极性。

三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注重培养一批智库型专业队伍,形成有利于智库型人才成长的培养方案和教育体制机制。

四是推动智库供需对接,促进智库与公共政策需求方的信息对称,确保智库研究的及时性、有效性和针对性。

五是深化研究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智库研究的选题机制、研究方法和手段创新。

·专家视点·

做正确的事 正确地做事

——在省社科界第九届学术大会高层论坛上的学术点评

田晓明



我认真聆听后很受启发！我在大学里分管人文社科研究工作近十年，应该说，也拥有不少切身的体会。借此机会，我也想与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

第一个感受：是科研评价的问题，两位专家刚才都已提到，从科研管理角度看，这里存在一系列递进式追问：

首先，科研要不要考核？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因为没有评价和考核，是无法实施有效的管理的。

其次，如何考核？科学的考核要求客观、公正、公平。

因此实际操作过程，必须拥有相对统一的评价体系，然而强调了评价体系的统一性，就必然会遭遇到实际操作困难。这种困难主要来源于学科的特色和学科间的差异。显然这是评价体系的系统误差。事实上，任何系统误差都是无法消除的，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在选择评价体系时尽量使系统误差最小化。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因为体系的系统误差存在，而全盘否定评价体系的合理存在。

第三个问题是：既然系统误差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管理行为的偏差便无法避免，那么如何修正和弥补因考评体系的系统误差所带来的管理行为偏差呢？有两种方法或途径切实可行且行之有效！一是发扬学术民主，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的功能；二是在总体评价体系不变的前提下，给学术管理者（如大学校长）赋权，让他能够根据具体情况（如学科特色或学科间差异）制定补充细则，完善评价系统，这就是管理学上的“例外原则”。

现在有一种声音，就是质疑甚至否定以论文、项目、经费、获奖、著作作为评价指标。我个人认为，这种想法不仅不切合实际，而且也缺乏学术理性的支撑。我并不否认，这些工具理性指标并不能完全代表研究者的科研水平，但反过来看，假如一个研究者没有论文、项目、经费、获奖等，肯定说明问题的存在。因此我们应该坚定一条：也许工具理性色彩很强

的评价体系还有很多不完善，大家可能并不满意，但凭良知说，大家还是能接受的。因为科学和人文本就是人类完美文化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我们不应将两者完全对立起来，自然科学研究需要人文情怀，哲学社会科学同样需要恰当的、合理的自然科学意识和精神。

第二点感受是：关于国际化问题。

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带有自身固有的特殊性：不可重复性、多样性等，在推进国际化过程中，我们固然需要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研究方法、高效的管理模式、灵活的运作机制等等，但绝对不能忽视、甚至无视中国的国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现在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目前最大的危机就是原创思想和知识的相对不足，甚至可以说匮乏。如何振兴中国社科，提升软实力，把握话语权，不仅是我们广大社科工作者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的机遇。

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我们江苏社科界及社科工作者是十分幸运的，也是十分自豪的。无论在社科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方面，还是新型智库建设方面，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这与近年来省委推进的“社科强省”战略以及省委分管领导的前瞻意识和忧患意识密切相关。以智库建设为例，江苏积极顺应国家发展战略，最早出台了“新型智库建设的实施意见”，最早开展“新型智库体系建设研究”，召开“新型智库发展高层论坛”，也是最早实施重点智库建设的省份之一。第一批9家重点智库正以自己非凡的业绩赢得各界好评。第二批15家重点培育智库也正在筹划之中。我们苏州大学东吴智库，作为全国最早以智库名义在民政部门注册的地方大学智库，也正在为这一伟大事业默默耕耘和努力。

江苏交通便捷，人杰地灵，还蕴藏着十分丰富的人文社科资源，相信，在省委正确领导下，我们江苏新型智库体系，一定会建设成为链接江苏乃至全国与国际创新体系的“桥头堡”，成为贮备先进思想和科研成果的“蓄水池”，成为汇聚政界、业界和学界人才交流的“旋转门”。

刚才聆听了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权衡理事长的精彩报告，受益匪浅，感慨良多！权衡理事长通过对国家高端智库的功能定位、基本特征以及国名智库的分析，指出智库“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对高端智库建设的重要性和必然性。他同样强调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是智库建设的关键。为此，他重点阐释了目前中国智库建设的几个体制、机制的瓶颈问题：如科研考核评价制度、科研经费管理制度、人才培养机制、供需对接机制以及研究体制机制的改革等。他还指出了科研经费管理体制的问题，人力成本占比较少显然不符合人文社科研究特点。我个人认为，当违反制度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我们肯定需要反思制度本身是否有问题。这就强调了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

权衡理事长的报告对江苏高端智库的建设很有帮助。我相信，沿着“国家急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目标要求，通过努力，我们江苏的重点智库一定在不远的将来，会跻身具有国际影响的全国高端智库。

刚才权衡理事长在他的报告中谈到了一个核心问题，即中国社科研究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问题，这其中涉及到一些关键词，如“科研成果的评价”、“国际化”等等。

•成果巡礼•

编者按：我校东吴智库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方世南和苏州市中科慧盛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夏金华的调研报告《关于加强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风险防控的建议》，刊发在苏州市委研究室 2016 年 2 月 16 日《决策参考》第 6 期。2 月 24 日，苏州市委书记周乃翔作了重要批示。方世南教授长期以来秉承“哲学走向荒野”的学术理念，理论联系实际研究生态文明，为国家环境保护部、江苏省委、苏州市委提出了加强环境战略评价、推进江苏生态现代化、污泥资源化利用、生态治水、土壤环境风险防控等方面的合理化建议，为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提供咨询服务。

关于加强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风险防控的建议

方世南 夏金华

加强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风险防控，是事关苏州生态文明和社会安定的重大任务，对于苏州安全发展和保障群众环境权益，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为此，要牢固确立风险意识，从加强政策法规建设、建立健全土壤质量档案和污染风险防控体系、健全管控体系和协调机制、提升土壤环境监管能力等方面着手，将苏州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

一、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风险是随时可能爆炸的“地雷”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产业结构调整，大批传统高污染、高能耗企业搬迁、关闭或停产，遗留的场地存在着程度不等的土壤污染，其污染物主要有重金属、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和放射性污染，毒性累积在人体，易损害器官及神经系统等，甚至引起人体病变和诱发癌症。

鉴于问题的严重性，2014 年，国土部和环保部联合发布了建国以来第一个全国性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调查显示，全国土壤总的污染超标率达到 16.1%，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重污染企业用地点位超标率达 36.3%，工业废弃地块点位超标率达 34.9%。根据我省多部门展开的土壤环境监测结果显示，苏南地区包括苏州的土壤环境相对严峻，尤其是重金属污染，它会通过粉尘、水源、空气等进入人体，并且终生无法排出和分解，破坏人的内脏器官和神经系统，对居民产生严重健康隐患。

苏州的传统产业比较发达，尤其是化工、电镀、电子、机械、印染等企业，如果历史数据不清楚或管理不到位，有可能在原厂区地块产生土壤与地下水的污染，而且累积的污染物质短期内大多难以自然降解。由于苏州地下水的水位比较浅，这些土壤污染还会扩散和迁移，往

往会引起一个片区的土壤与地下水污染，其中苏化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不进行全面调查，建立土壤安全档案和及时进行治疗修复，污染物可能会不断扩大范围，通过地下水、空气、粉尘等介质进入人体，并最终威胁人的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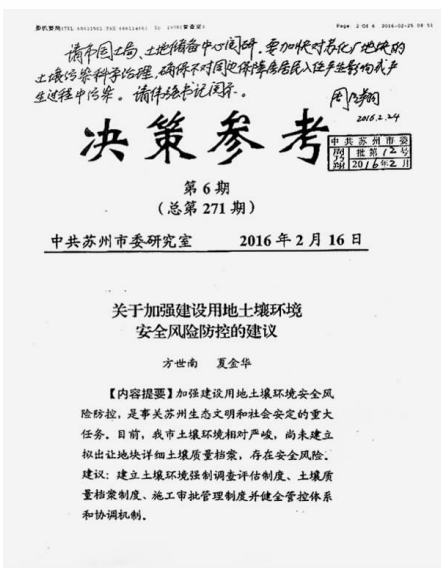
苏州全市范围内每年有几百幅土地在招拍挂，相关部门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并没有建立全面的拟出让地块详细土壤质量档案，尤其是该地块的土壤与地下水有无污染及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相关程度分析，目前很多还是空白，这些都是随时可能爆炸的“地雷”。政府和开发商对土壤质量与安全状况不了解，便无法科学合理规划土地利用，而且一旦出现土壤污染事故，不仅会造成政府、开发商、业主的连环纠纷，还会带来群体事件，影响社会稳定及苏州城市形象。

二、加强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风险防控的建议

针对工业场地改变用地性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土壤安全问题，由环保部牵头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与文件，湖北、广州等地也开展了先行探索。我们感到，苏州在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风险防控方面理应有所作为，而且完全有条件当好试点和示范。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 建立土壤环境强制调查评估制度。环保部门对拟搬迁的工业企业，应严格管控受污染土壤的环境风险，明确修复责任主体及修复指标。同时，应建立土壤质量信息数据库和区域土壤污染档案，为合理规划土地使用类型提供参考。在国家土壤污染防治法正式出台前可先行试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

2. 建立土壤质量档案制度。国土部门在土地流转过程中，需出具土壤质量档案，使开发商了解土壤质量现状，明确政府及开发商在土壤流转过程中关于土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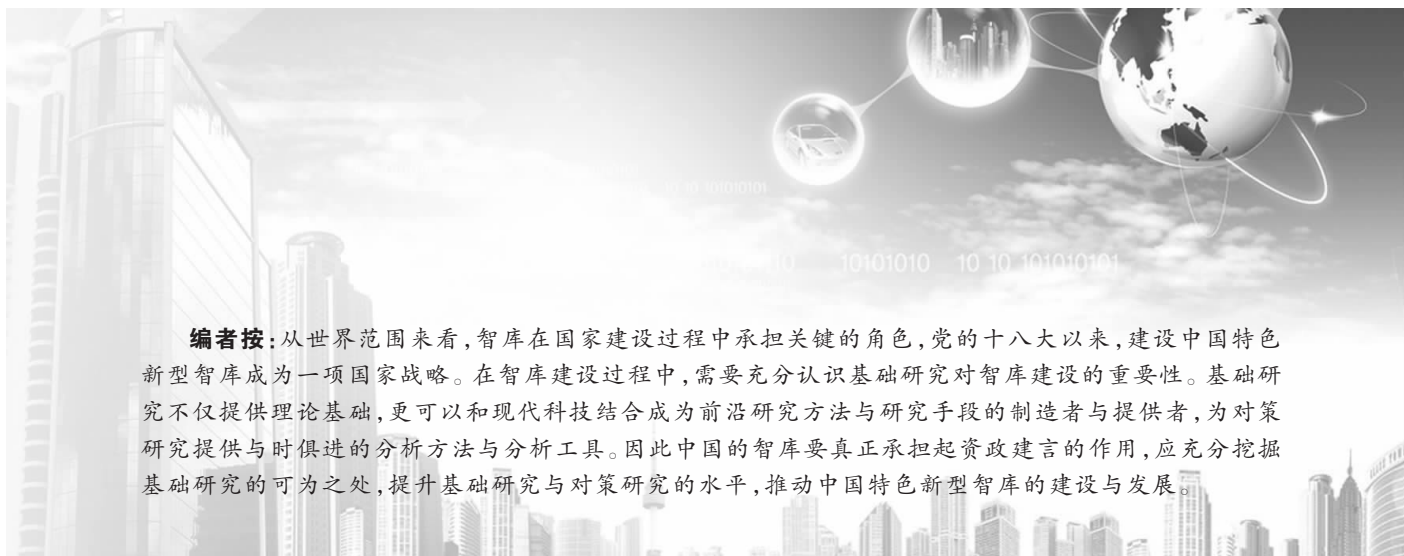


污染和修复的责任。开发商在拿地之前，可要求国土部门提供土壤质量数据。对于已通过招拍挂程序依法转让到开发商名下，但还未正式施工的，应该做更细致的土壤调查和分析，并备案存档，建好“最后一道防火墙”，为建筑设计提供科学依据，把可能存在的土壤污染隐患彻底排除，以免工程结束才发现“毒地”问题。

3. 建立施工审批管理制度。规划与住建部门负责监管场地再开发利用建设项目的施工审批和管理，禁止在未经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的工业企业场地，以及经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确认属于污染场地而未经治理修复的工业企业场地上开工建设与治理修复无关的任何项目。

4. 健全管控体系和协调机制。建立由环保、国土、规划、住建等部门组成的联合项目组，环保部门在拍地之前先进行土壤的质量安全检测，掌握全面的土壤本底档案；国土部门根据检测结果和安全风险分析情况将合格的地块和有污染的地块进行区分管理，把污染地块通过合理方式封存或做绿化，从而降低法律风险和问责风险。

•权威视点•



编者按：从世界范围来看，智库在国家建设过程中承担关键的角色，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成为一项国家战略。在智库建设过程中，需要充分认识基础研究对智库建设的重要性。基础研究不仅提供理论基础，更可以和现代科技结合成为前沿研究方法与研究手段的制造者与提供者，为对策研究提供与时俱进的分析方法与分析工具。因此中国的智库要真正承担起资政建言的作用，应充分挖掘基础研究的可为之处，提升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的水平，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与发展。

充分认识基础研究对智库建设的重要性

薄洁萍

（光明日报社理论部副主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成为一项国家战略。随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各地掀起了“智库热”。据有关机构和专家的保守估计，2014—2015 两年来我国新挂牌的各类智库在 5000 家左右（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5 年《全球智库评价报告》）。可以预见的是，今后几年，随着国家对智库建设投入力度的加大，智库的数量还会大幅增加。这对于推进我国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进程，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无疑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具

有战略性意义。然而，面对智库数量的高速增长，也有不少学者表示担忧，认为如果忽略了智库质量的建设，则会违背我国智库建设的初衷。

笔者以为，这种担忧并非多余。尤其是，智库建设如果忽略了对基础研究和基础建设工作的重视，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众所周知，美国是智库大国，更是智库强国，在世界各类智库评价排行榜上，美国的智库不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都独占鳌头。我国许多智库研究者从美国智库的特点、运作模式以及与美国政府的关系等方面分析其原因，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而笔者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促使美国智库能够真正起到智囊团的作用，那就是美国拥有全面而扎实的基础研究知识，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巨大成果，支持着美国智库取得辉煌业绩。

以区域研究为例。区域研究是美国大学的一项重大发明，产生、发展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美国高等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美国有许多大学建立了众多区域研究中心、研究所和研究项目，以同时处理世界许多地区的相关问题。通过重叠与竞争，这些研究机构共同提供了全球视野。”“美国区域研究和教学的超常发展和全球覆盖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美】戴维·L·

桑顿：《美国区域研究的起源、性质与挑战》，刘新成主编《文明研究》第一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而这种“超常”往往会令被研究国的学者感到惊异。曾有留美历史学人深有感触地表示：美国对中国了解的深度与广度并不亚于中国教授，“美国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远远跨出了政治史和军事史；他们对中国近现代的经济、社会、农民、工人、妇女、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研究”“许多的研究和结论，经常让人耳目一新，振聋发聩”（王希、姚平主编：《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355、357 页）。美国人认为，对于认识和了解美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来说，“美国所需要的并不只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还需要专注于这些社会的基本结构与动力，它们的社会组织、人口、社会心理、文化与道德价值观、审美、宗教传统、宇宙观与哲学观等方面研究的人文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这种知识不仅对政治分析家、外交家和发展专家有用，而且也能用在商业、媒体、初等与中等教育以及基础建设等方面。不仅在形成、推动和指导海外计划方面，而且在将其广泛传播给更多民众的高等教育领域方面，这种知识也显得尤为必要”（戴维·L·桑顿：《美国区域研究的起源、性质与挑战》）。

·权威视点·

事实上,美国对中国、日本等世界主要国家的研究,成果卓著,堪称经典,其彻底性、细致性、前沿性均令人难以望其项背。如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政府急需了解日本社会和日本这一民族的特性,以制定相应的政策。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写作了著名的《菊与刀》。1946 年该书出版后,在美国、日本等国引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读书,也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直接运用于现实政治操作的杰出例证。

虽然美国的区域研究曾遭到诸如“是为了赢得冷战而采取的一项措施”“本质上是为了‘了解敌人’”等的诟病,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无论美国关于世界的知识体系中有多少文化霸权的动因、美国中心主义的目标和‘东方主义’的偏狭,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知识体系是充实、全面而强大的,它构成了美国作为世界帝国的知识和文化,或者说‘软实力’基础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牛可:《美国“地区研究”的兴起》,《世界知识》2010 年第 9 期)。

正是在这些看上去与政治关注相去甚远的领域,如历史、哲学、人类学等基础研究领域所建立起来的庞大知识库存,支撑了美国构建“大政府”的历史进程,而从事基础研究工作的专家也成为美国政府机构及各大智库专业人才队伍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二战以来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组成和运作,便集中显示了强大的基础研究和智力资源对于国家目标服务的重大作用。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创立者威廉·约瑟夫·多诺万坚信,“在许多美国大学里平静地从事教学研究的人中不乏专攻外国历史以及外国地理和语言的人,(情报工作)不去吸收利用这一巨大的知识储备,乃至这种密集的学术研究训练和这种从更广阔的视野中看问题的习惯,是一个莫大的错误”(牛可:《情报机构里的学术人: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世界知识》2010 年第 20 期)。基于此认识,“战略情报局的研究分析处就成为国际学者的会聚之地。该处主任是哈佛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兰杰,他把自己的许多不同系科的同事招募进来,而其中的资深学者又把自己的博士生也领进来。战时新闻办公室也是如此,来自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克莱德·卡拉克洪、历史学家费正清,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都在此效力”(牛

可:《美国“地区研究”的兴起》),“更足可惊叹的是,研究分析处里出了七位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五位美国经济学会主席,以及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牛可:《情报机构里的学术人: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

也正是这些平静地从事基础领域研究的学者构成了美国各大智库的矿藏,一旦被发掘利用,就能产生巨大的能量。1957 年,苏联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其发射时间与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在预测报告中详细推断出的时间仅差两周,这一消息震撼了美国朝野各界(《王辉耀、苗绿著:《大国智库》,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52 页)。9·11 事件之后,美国需要迅速了解因应生物恐怖主义袭击的最佳防疫方案,兰德“在第一时间集中医学、统计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的人才迅速提供了基于严格分析的答案”(冯绍雷主编:《智库——国外高校国际研究院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89 页)。可以想见,智库取得的这些成功离不开系统地、大规模地利用人文社会科学家的专门知识。如果没有扎实细致的基础性研究和对现实的长期观察跟踪与调查研究,所谓的预测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智库从学术界系统地汲取人文社会科学智力资源,在两者间建立一种密切协作的关系,是美国智库能够胜出的重要因素。正如美国前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时任福特基金会主席的麦乔治·邦迪在 1967 年总结福特基金会赞助地区研究的工作时所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场革命:关于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研究,特别是关于俄国和中国的研究,已经成为美国学术体制中不可或缺的、内在的组成部分”(牛可:《美国“地区研究”的兴起》)。

反观我国,在人文社科等基础研究领域则与美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以世界史研究为例,据统计,我国高校历史院(系)中,从事世界史教学科研工作的教师平均占全体专职教师的四分之一左右。许多地方院校甚至只能维持教学,没有能力搞研究。从研究的国别、地区领域来说,全国有限的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欧洲、美国和日本,研究中东、中亚和拉美的少之又少;专门研究意大利、加拿大的人员也非常

稀缺;即使是研究得比较多的大国,如美、英、德、法、俄等,其历史与文化也有不少空白需要填补。印度、越南是我们的邻居,但全国研究印度史和越南史的学者屈指可数。非洲与中国关系紧密,而对非洲的研究却远远不能满足现实发展的需要。应该说,基础学科和基础领域研究不足,在我国不是个别现象。

显然,这样的研究现状不论从人员数量还是从研究质量上来讲,都很难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日益增长的各类智库也基本缺乏从事基础研究的专家和研究成果做支撑。虽然早有学者指出,智库主要功能是进行对策研究,必须超越基础研究,寻求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之道。这当然是正确的。但试问,如果连基础研究都没有或非常薄弱,又何来对它的超越呢?没有扎实的基础研究做支撑,对策研究又能有多少深度和可行性呢?现在我国正在大力建设“一带一路”,涉及沿线 60 多个国家,以我们现在对这些国家的研究现状来看,有多少可以做到像美国的区域研究能达到的那种高度呢?而如果对这些国家的了解仅限于表面的甚至只是大概层面的,做不到对其历史演变、哲学和宗教信仰、审美和社会心理等人文传统的深入探究,许多问题就看不到其产生的深刻根源,从而也就很难提出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对策来。

因此,中国的智库要真正承担起资政建言的作用,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充分重视和支持基础研究,并加以合理利用。只有立足于扎实的基础研究这一富矿之上,才能行稳致远。

(据《光明日报》2016 年 02 月 17 日 16 版)



·思想花絮·

人，应该不断证明自己

晓明



“东坊艺术空间”即将面世了，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好友钱流教授再三相邀，让我为此写点文字。我虽然不是什么达官贵胄，但却一直笃守着读书人应有的自知之明，作为艺术门外人，自觉十分为难。于是，我选择了婉转推却。但钱兄似乎有些“不依不饶”，丝毫不顾老友的顾虑，娓娓道出自己的理由：“我已是退休之人，发起‘东坊艺术空间’，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就是想为这个美好世界和这座美丽城市做点事情、留点念想，待‘回首往事’时，也不会为虚度年华而羞愧，至少可以证明我们还是‘有用之人’！”拗不过兄台的倔强，更有感于一名退休教授的由衷之言，我妥协了。

是啊，人，有时须要证明自己！

对此，我感同身受——

八年前，我履新大学文科副校长之初，内心也不无纠结：因为出身理工，不免有人怀疑我不懂文科；因为出道行政，自然有人质疑我不事学术；因为地道的“土鳖”，没有“985”大学或“海归”等显赫背景，难免有人发问“其人何德何能”？……尽管这些怀疑和议论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自己内心深处那份矜持和执着，但对我而言，这确实也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八年来，无论是治学还是工作，我或虚心问道于前辈、或诚心请教于同事、或潜心求解于书本、或精心问答于实践，确保做到在学术上不失语，在行为上不失范，在工作上不失职，在精神上不失守，并以显著的事业发展业绩证明了自己。

两年前，我在特殊情况下兼任艺术学院院长。面对圈内圈外、院内院外、校内校外的一片质疑，我选择了坚守。两年来，我与艺术学院的同仁们一道，不断探索总结，大胆开拓创新，潜心探寻规律，

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队伍建设、平台建设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赢得了广大同仁的认同和好评。我再次证明了自己。

……

时光掷人去，天命已知矣！回眸这一段段只有用“出膏自煮”方能道出“行路之难”的过程，我确实难抑心中的感慨。证明自己，不是凭借自己华丽辞藻的修饰和动人言语的堆砌，而是依靠务实笃行、行之有效的行动积累。人，一旦拥有了成功证明自己的业绩，就能培养和铸造成就一番事业的自觉和自信，更能迸发出强大的创造力。即便在这个充满功利的世俗社会，成功也可能会招来种种非议，但“体验成功”者总是那样从容和淡定。也曾有人调侃说，那些试图“证明自己”的人，其内心往往是“自卑”的。这样的说法，让我不禁想起了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德勒教授独特的人生经历和非凡功勋，“自卑与超越”，这是一个多么深切的话题，而我的心痒和力疲，不正暗合着这一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生话题吗？！

在我看来，钱流兄以及“东坊艺术空间”的艺术家们其实已经不用“证明自己”了，因为他们取得的骄人成就早已高高悬挂在枝头。一定意义上说，“东坊艺术空间”的面世，是这些艺术家进行艺术探索的远涉和空间展开，用“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来形容，应该更加准确。但在与钱流等艺术家频繁而深入的交流中，我似乎又“读懂”了他们希望“证明自己”的心声。我知道，在这些充满创造力的艺术家心中，不仅激荡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进取冲动，更叠印着他们一路走来的难以言表却无法抹去的酸楚与艰辛。

我与钱流兄相识于2008年苏州图书馆举办的“西花桥油画展”。“西花桥”，这一曾经深深“刺痛”我心的地名，使我和钱流、张新权、刘昌明、张骅骝、黄晖、戴家峰六位老师“走”到了一起。亲眼目睹这一批实力派画家在外“漂泊”多年，作为大学分管副校长，我内心深感愧疚！……他们“回归”之后，依然保留着“西花桥油画工作室”的名号，显然这是一种出于文化遗产的考虑，但对我而言，却是一种很好的警示。

2008年的“刺痛感”还在不断加深：张新权教授不久之后离开了苏州大学。我想，这种“刺痛感”不应该是我的“专利”，而应有更多的“分享者”。……世事往往就是这么巧合，两年前，我正在台湾讲学，学校党委急召我返校，让我兼任艺术学院院长。面对这份特殊的任命，我没

有太多的推却，因为我知道，这是“上苍”对我的眷顾，使我有机会减轻甚至消除这种深深的“刺痛”。

两年来，在学校党政主要领导支持和全院上下共同努力下，我们不仅有选择地从西班牙、乌克兰引进了一批知名艺术家，还有计划地选送一批青年教师分赴法国、英国、美国、台湾等地深造；不仅及时补充了一批年富力强的实力派教授，还从中央美院、中国美院、清华美院等知名学府选拔了一批具有发展潜力的后起之秀充实教师队伍，师资队伍面貌可谓焕然一新。为了使广大教师拥有施展才华的空间、平台和机会，我们组建了“苏州大学艺术研究院”，并积极拓展办学空间。可以说，以“苏州大学艺术研究院”下属之“艺术创作中心”为主要支撑的“东坊艺术空间”正是这一办学举措的成效彰显。从当初六位老师在外“漂泊”到而今三十多位老师的集体对外“拓展”，其外在表现形式似乎有些相似，但个中却有着本质的不同。也正是在对这种从“漂泊”到“拓展”的比较、体验和反思中，我内心深处的那种“刺痛感”在渐渐减轻！

我发自肺腑地敬重这一艺术家“公社”，这不仅仅是出于对“社员”们艺术创作水准和创作热情的敬意，更欣赏他们能够准确理解和有效把握“天时、地利、人和”的敏锐和智慧。瞄准国家大力加强文化建设的战略，可谓顺应“天时”；扎根千年历史文化名城苏州，可谓占据“地利”；摒弃“文人相轻”之封建糟粕，弘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优秀传统，“为了共同的目标，大家走到一起来了”，可谓珍视“人和”。而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这一艺术家群体，必定会走得更深、更远！

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其《艺术的故事》中有一段精彩的开篇：“实际上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在各种艺术作品的背后，站立着它们的创造者，面对艺术作品，实际上就是倾听创造它的艺术家的心曲，并与艺术家展开对话。这样的倾听与对话超越时空，激发想象，造就了艺术的不朽与神奇。

大凡有名的人物或组织，都是有故事的，“东坊艺术空间”及其艺术家们也不例外：这里不仅拥有功成名就的艺术家，也有一批年富力强的中流砥柱，还有一批意气风发的后起之秀！我期待着，期待他们演绎更多、更美、更精彩的故事！

言语至此，我似乎对钱流教授“证明自己”的意蕴又有了更深的理解：人，应该不断证明自己！

（据2015年5月29日《姑苏晚报》）